

牙璋探索——大汶口文化至二里头期



邓淑苹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牙璋”不是“璋”的一种

“璋”字最早见于西周史料,包括《诗经》与金文。《诗经·大雅·卷阿》用高贵的玉礼器“圭”“璋”歌颂君子品德纯洁,名声威望传四方:“颙颙昂昂,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在此,“璋”是排在“圭”的后面^①。速盘、速鼎与颂壶、颂鼎都是周宣王时的铜器,所铸铭文记载西周晚期册命礼的仪轨。作器者“速”和“颂”接受了周王的册命与赏赐出门,然后对有司行纳觐之礼时,速盘铭文所记为“返入觐圭”,颂壶铭文所记却为“返入觐璋”。或显示“速”与“颂”在当时的身份位阶是有高低差别。

总之,史料证实西周(约公元前1046至前771

年)礼制中确实有一种名为“璋”的玉器。有学者考证西周时“璋”可能是扁平长条形的玉版^②。芮国墓地中确实出土这类玉器(图一),报告中也将之定名为“璋”^③。

《周礼》可能写成于战国。《周礼·春官·宗伯》记录祭祀天地四方的六种玉器,即所谓的“六器”,其中“璋”是祭祀南方的玉礼器^④。但是《周礼》书中并没有描述各种玉器的形状。直到东汉许慎(约30—124年)所撰《说文》,才对“六器”里的六种玉器都作了形制描述,“璋”也被定义为与圭有关的玉器:“剡上为圭,半圭为璋。从玉章声。”从联志村、芦家口等西汉祭祀遗址出土玉器可知,汉代的玉璋确实成“半圭”形(图二)^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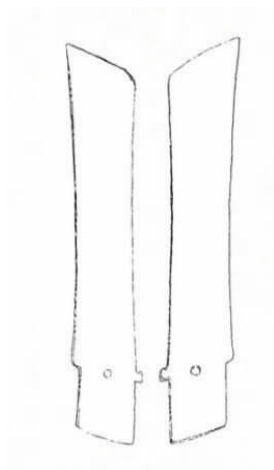
《周礼》书中还记载了“牙璋”、“赤璋”、“璋邸射”



图一 西周玉璋
高21厘米
(芮国墓地出土)



图二 西汉玉璋
高8.2厘米
(联志村出土)



图三 《古玉图考》中的
“牙璋”



图四 清末“牙璋”
高36厘米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五 石峁文化牙璋
高38厘米
(哈佛大学博物馆藏)

等器名。“牙璋”是“起军旅的玉礼器”^⑥。但《说文》里没有关于“牙璋”形制的描述。

直到19世纪末,金石学者吴大澂在其《古玉图考》中^⑦,根据东汉郑众(司农)、郑玄(康成)批注《周礼》,指称图三这件器身旁出有“牙”的玉器就是“牙璋”。自此,“牙璋”一名就和考古出土的一类玉器结了解不解之缘。

熟悉考古资料的学者应可看出,图三很可能是一件19世纪晚期制作的仿古贗品。贗品的产生,意味着制作贗品的时代,收藏界正流行收藏造型相似的真品。笔者早年走访欧美各收藏中国古玉的博物馆,确知吴大澂收藏过贗品“牙璋”,也收藏真的“牙璋”。前者见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藏(图四)^⑧。后者属美国哈佛大学温索普收藏(Winthrop Collection)(图五),该馆1975年出版品上清楚注记“Formerly in the collection of Wu Ta-ch'eng”^⑨。笔者于1979年在福格博物馆(Fogg Art Museum)库房检视过实物,虽然在那个年代,这类玉器多被订为“周代”,但在今日考古学资料显示,它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陕北石峁文化的墨玉牙璋。

活跃于21世纪前半的古董商卢芹斋(C. T. Loo),在他与伯希和1925年合作出版法文大书中^⑩,就清楚地记录:“北京的古董商人声称这些玉器出自榆林府。”^⑪卢芹斋又在他1950年出版的图录的前言中记录,吴大澂所藏“大型黑色长片状器 large and black tablets 卖给法国吉斯拉(G. Gieseler)和美国的匹尔斯白瑞(A. F. Pillsbury)。”^⑫此二收藏后捐赠给巴黎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院(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⑬。检视此二馆藏品,确实有数件石峁文化风格的墨玉牙璋与多孔长刀。

虽然吴大澂收藏过多件真正的石峁文化墨玉牙璋等,但光绪15年(1889年)出版的《古玉图考》中,只用线绘图注录一件看似贗品的牙璋(图三)。笔者推测那些真品可能是《古玉图考》付梓后到吴大澂去世前(1889—1902年)购入的藏品。

由于吴大澂的收藏与《古玉图考》上的考证,导致今日考古学界多称如图三至图五这类玉器为“牙璋”。虽然夏鼐反对之,建议改称为“刀形端刃器”^⑭,部分学者也曾引用夏鼐的定名^⑮,但该器名未能普及开来。大家仍称图五及本文讨论的主题玉器为“牙璋”。事实上这只是约定俗成的称法,我们无法知道距今数千年前制作、使用这类玉石器的先民如何称它们,就只能暂时沿用大家“习用”的名词罢了。

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璋”是周代、汉代的玉礼器(图一、图二)。本文所称的“牙璋”基本造型分为:

本体、扉牙、柄三个部分^⑯。这种玉器不出现于周、汉时期的礼制中,所以千万不能误以为:“牙璋是璋的一种”。近日不少正式考古书籍中,误将“牙璋”直接称为“璋”或“玉璋”,更助长了玉器器名使用的混乱。

二、四十年笔者研究“牙璋”的回顾

笔者于1979—1980年曾在欧美地区连续参访多间收藏中国古玉的博物馆,得以在各库房内,尽量检视那些在二十世纪前半流散海外的中国古玉^⑰。

欧美博物馆中收藏很多黄河上中游史前玉器,璧、琮、多璜联璧、各式带刃器等^⑱。其中大量带刃器的玉料具有相似的特征。它们质感细腻、透明度低,多为灰青、墨绿、暗褐,常隐隐显出不规则团块或波浪式条斑(图六),也有的色深近乎黑色(图七)^⑲,它们多用以制作多孔长刀或牙璋。从戴应新1977年、1988年发表论文可知^⑳,它们应出自陕北神木石峁地区。

累积了在欧美地区检视近二十间博物馆馆藏中国古玉的经验,笔者于1989年前后,为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购藏了多件这类带有沉积岩文理的有刃器,选择其中三件委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陈光祖研究员,以X光绕射仪分析测定质地,确定它们虽与一般人认知的莹秀美玉不类,但其质地确为闪玉 nephrite^㉑。检测结果发表于1990年与2007年论文^㉒。

1990年笔者赴西安访问戴应新研究员,邀请他



图六 刻纹玉刀

长47.8、宽17、厚0.9厘米

(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藏)

(笔者近年论著中称这类闪玉为“第三类华西玉料”)^㉓



图七 牙璋

长35.6、宽8.4、厚0.4厘米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院藏)

(笔者近年论著中称这类闪玉为“第五类华西玉料”)

(同上注)

将征集的一百二十多件玉器撰文《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寄到台湾,笔者将之按内容分六期发表于1993年8月至1994年1月的《故宫文物月刊》^③。为此,笔者亦撰写六篇《也谈华西系玉器》,配合刊出^⑤。

这六篇是迄今唯一完整公布1976年征集石峁玉器的资料,弥足珍贵。但需补充说明,文革时大批比较厚实的石峁出土玉器,被收购当作玉料改制他物,出口创汇用。所以能征集到的,都是当初被淘汰的,比较薄而残的玉器^⑥。

在《也谈华西系玉器(二)-牙璋》一文中^⑦,笔者用地图配合说明当时出土牙璋情况,中、日学者研究情况,再根据自己在海外检视实物的经验,归纳流散日、美、加、英、法、德、南非等国的牙璋是以石峁文化为大宗,也有少数四川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的牙璋^⑧。据此,在该文中笔者认为牙璋应是华西地区的玉礼器。文中指出戴应新征集的28件牙璋中,多数刃部做浅弯弧形,但有一件刃部作“V”形的细长型牙璋高达47厘米,可能是石峁牙璋中年代较晚者,它可能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地区“V”形刃线牙璋的滥觞。

1994年二月邓聪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会议前即出版论文集《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⑨。在该书中笔者发表《“牙璋”研究》一文,文中依循林巴奈夫对牙璋形制的编年原则^⑩,归纳当时公布的十四个地点出土或征集的八十二件牙璋的形制分类与发展顺序。除了分析考古资料外,该文普查西文及日文出版品,结合笔者1979—1980年旅行笔记,将当时已查知的,分散于世界各地22处约54件牙璋作了综合整理与描述。其中数件还因造型特征,可核对最初是由卢芹斋或黄浚出售^⑪。从笔者的统计归纳可知,石峁文化牙璋不但是海外流散牙璋的大宗,且早在1925年牙璋已进入国际古物市场^⑫。

于此同年,笔者撰《扑朔迷离话牙璋》一文^⑬,将香港中文大学重要的牙璋会议及出版品讯息,介绍给台湾及全球华文读者。

同一期月刊也刊登山东省文物局王永波研究员的论文《关于刀形端刃器的几个问题》。在当时,该文最先发表山东三个地点:临沂大范庄、五莲上万家沟、海阳司马台所出土四件牙璋的多面彩图与线绘图。更重要的是公布各遗址在当时的地貌图景,报导了历次发现与征集经过^⑭。此外,该文可能是迄今唯一一篇,公布了司马台出土的一件墨玉有领璧与一件灰黄玉石牙璧,当初出土时二者套迭时的两面图片^⑮。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山东省博物馆于秋伟主任将沂南出土牙璋发表于《故宫文物月刊》^⑯。文中报

导1988年在山东沂南县中高湖乡罗圈峪村,因乡民为了替儿子建筑新房,用炸药爆破山脚的岩石地,意外发现土石间宽约20厘米的天然缝隙中,埋有多件玉石器。其中有三件可用断块拼成尚称完整的牙璋^⑰。

总之,在20世纪最后十年内,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提供出版园地,令大陆学者将陕北神木石峁出土28件牙璋,及山东四个地点出土7件牙璋的相关资料^⑱,作了较完整的报导。笔者也配合这些来稿与香港学术会议发表个人的论述。

也在这期间,笔者为台北故宫购入二件牙璋,其一属龙山期。另一属四川广汉月亮湾文化^⑲。后者还曾获四川大学林向教授的检视与肯定,发表于1999年5月的《故宫文物月刊》^⑳。文中除了说明1927年燕家院子出土三、四百件玉石器的经过^㉑,还推测牙璋可能起源于龙山时期的陕北地区,经由征伐或交易,流传至东夷的地盘。

进入21世纪,笔者在栾丰实教授的协助下,分批检视出土于河南、陕西、甘肃、湖北的牙璋。2008年,笔者检视了山东境内的四批共7件牙璋,认为罗圈峪、大范庄各有一件相当古拙的牙璋,年代应较早。但海阳司马台、五莲上万家沟出土的二件,从质地、造型可知,应是直接来自石峁的成品。笔者在2014年、2018年发表的论文中,牙璋都占一定的篇幅。

2014年,拙作《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中^㉒,笔者接续1994年“海外流散”石峁风格牙璋统计工作,除了增加《玉器时代》一书公布五间美国博物馆藏品^㉓,再增加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广东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所藏牙璋^㉔,以及台湾公私收藏资料^㉕,加总起来共有70件;合并戴应新研究员所征集,共98件相当明确的石峁文化牙璋。

但事实上,所谓“考古出土”或“有明确地点征集”的资料中,非出土于陕北的,仍有不少属石峁风格牙璋,除了前述的山东海阳司马台、五莲上万家沟二地外,陕南的东龙山,甘肃清水县连珠村,甘肃定西静宁、河南新郑望京楼、河南郑州杨庄等地出土的牙璋,从玉质、造型观察,极有可能都是石峁文化先民制作,不过因埋藏环境而有不同的沁色。所以,虽经包括文革在内的历代浩劫,石峁牙璋应尚有百余件存世。

在2014年拙文里,笔者强调以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连成的,自东北向西南的山脉链,阻隔了高亢干燥的华西与低平湿润的华东。华西、华东各蕴藏数种外观明显有别的闪玉(nephrite),基本上在史前至历史早期,闪玉是贵重稀有资源,易被交通近便的强势政权垄断,所以虽然龙山文化至夏时期



图八 月亮湾文化 牙璋二件

(笔者 2006 年摄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图九 石峁文化 牙璋

(笔者 2006 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图一〇 石峁文化 牙璋 长 27.5 厘米 (司马台出土)

(约公元前 2300 至前 1520 年)^⑧, 华夏大地上很多地方都有用玉器祭祀神明祖先的传统, 但因为“地区性玉料特征”差异, 发展出“地区性玉器文化”差异。形成“万国玉帛”的多元场景^⑨。

闻广教授曾研究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藏多件牙璋与长刀, 将之作了切片扫描电镜显微结构研究, 确知它们无论颜色从浅至深, 常保留变质前沉积岩文理, 诸如不规则团块、波浪般的韵律条纹等。但虽然看起来“疙疙瘩瘩”, 事

实上是极细小的“雏晶”构成, 也因此质地致密, 可剖成长刀、牙璋之类大薄片的带刃器而不会崩破^⑩。陈东和副研究员利用拉曼光谱及加速器 PIXE (粒子诱导激发 X 光荧光光谱) 分析技术, 研究巴黎吉美博物馆所藏早年流散的石峁墨玉牙璋、长刀等, 确知其中铁离子含量高达 5wt% 至 12wt% 左右, 锰与镍的含量也较高。这可能是玉色深沈近黑之故^⑪。

笔者观察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的牙璋 (图八), 除了造型、扉牙、器表刻纹等与石峁牙璋相似外, 深褐近乎黑的色泽也很相似 (图九)^⑫。但因为四川温暖潮湿, 所以器表多分布蛛网般的白色沁斑。

换言之, 约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同时的月亮湾文化, 还可获取深色近黑的闪玉料^⑬, 但时代稍晚的三星堆文化 (约商中晚期) 出土的牙璋, 内部原来多为白色闪玉, 但表面加涂由蓝、灰等多种颜料配成的一种黑里透红的颜色, 出土时器表已产生严重次生变化^⑭。是否三星堆文化先民无法如月亮湾文化先民一样取得近乎黑色的闪玉, 但因为要追求特殊神秘的“玄”色效果, 而将牙璋染成黑色呢? 值得追踪研究。

除了牙璋外, 有领璧也是值得注意的器类。前文提及王永波研究员 1994 年论文发表了海阳司马台遗址里, 与墨玉牙璋 (图一〇) 共出的一组, 由墨玉有领璧与牙黄色牙璧套迭的腕饰 (图一一、图一二)。图一一有领璧的墨玉质感与图一〇墨玉牙璋极相似, 很可能也来自石峁^⑮。

近年考古资料显示, 用两件或多件玉、铜等质地



a



b

图一一 a,b 石峁文化(?) 墨玉有领璧

外径 11.7、孔径 6.6 厘米 (司马台出土)



图一二 石峁文化(?)有领璧与牙璧套迭出土
(司马台出土)



图一三 石峁文化 一组套叠的牙璧与铜齿轮环

的腕饰套迭佩戴的习俗,主要出现于陕北石峁文化,如图一三玉牙璧与铜齿轮环套迭,图一四用两个玉璧中间套迭五个铜环、一个铜箍,虽然这二组件都是盗掘品,但已得到考古学家的鉴定与肯定^④。图一五是出自陶寺文化晚期小墓的一组腕饰,一件玉璧与一件铜齿轮形器套迭而成^⑤。由于陶寺文化晚期遗存中,确有残暴的外来侵略现象,不排除图一五腕饰来自石峁文化^⑥。

由于有领璧与牙璋时有共出现象^⑦,笔者怀疑二者具有特殊的神秘内在联系,可能二者从陕北沿着“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⑧,经甘肃传播至川西平原,再或分或合地经云贵高原传到了越南。而有领璧甚至传播至马来半岛^⑨。

在2014年拙文里,笔者还分析了牙璋柄部的圆孔部位透露了该件牙璋的使用方式。如果圆孔位于



图一四 石峁文化 用两个玉璧中间套迭五个铜环、一个铜箍作为墓主腕饰



图一五 陶寺墓 11 出土玉璧与齿轮铜环
玉璧径 12.4 厘米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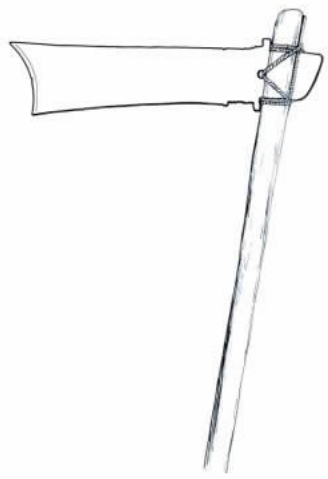


b

图一六 石峁文化 牙璋 石峁征集?

a.全器 b.柄端

长 32、宽 7.5、厚 0.3 厘米 (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图一七 牙璋加装木柄想象图 (邓淑苹复原图)



图一八 石峁文化晚期 牙璋 石峁征集
长 49、宽 7.8、厚 1 厘米 (编号 SSY17)
(戴应新 1993-94(二)第二十六号璋)



图一九 三星堆文化 执牙璋(?)铜人

左右两扉牙所连成直线的中央下方(图一六)^⑥,当是如图一七般绑缚木柄使用,此时刃线多为圆弧形,也常看到刃部带使用痕。

但若圆孔位置上移,离开了柄部,进入扉牙的区块时,那就无法绑缚木柄,而只能以刃端向上的方式,用手捧执。据笔者统计,此时刃线常作“V”形,且多无使用痕。图一八是 1976 年所征集牙璋中唯一具有前述特征的一件,编号 SSY17,也是该批 28 件牙璋中特别高长的一件^⑥,应是如三星堆文化中用手捧执。图一九则是三星堆出土捧着似牙璋形器的小铜



图二〇 石峁文化 牙璋
长 30 厘米 (1976 年戴应新征集 编号 SSY18)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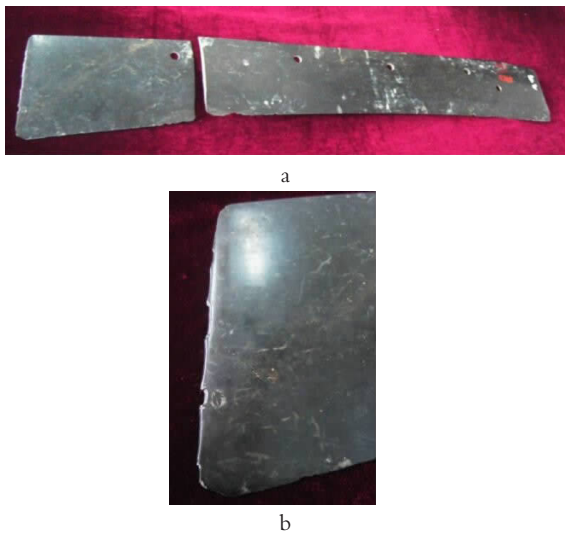


b

图二一 石峁文化 玉刀
长 45.87 厘米 a, 全器 b, 局部
(匹尔斯白瑞收藏)

人^⑥。

笔者在 2014 年论文对牙璋提出的看法甚多,虽隔了数年,上述观点应仍具可信性。2017 年秋,笔者参加成都金沙博物馆举办会议,发表有关晋陕高原在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玉器文化的论文^⑥。笔者提出的新观点为:推测海岱地区的牙璋,与该处流行的,从河姆渡文化“[介]字冠顶”发展的“华东式扉牙”均向西传播,因为陕北石峁地区蕴藏含铁量高的墨玉矿,



图二二 石峁文化 玉刀 断为二
分别长 11.6 与 40.4 厘米 a, 全器 b, 宽端上的扉牙
(1976 年戴应新征集)

石峁文化先民用墨玉制作具杀伐力的薄锐型牙璋，用作兵器，并装饰源自“华东式扉牙”的“对称多尖式扉牙”（图二〇）^⑥。这种神秘的扉牙也偶见于石峁墨玉长刀（图二一、图二二）^⑥。

三、近年学界牙璋研究概略

21 世纪曾举办两次与牙璋有关的学术会议。2013 年在余杭召开“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同年出版的《玉器考古通讯（二）》发表会议纪要，对几篇牙璋方面论文作了特别报导^⑥。次年亦出版论文集^⑥。

2016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联合举办“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约四十余位学者与会。会议纪要发表于《玉器考古通讯（八）》上^⑥。次年李伯谦先生以《再识牙璋》一文，对该次会议作了纲要性综论，也述及作者个人对牙璋萌芽、传播路径的观点，相当具有启发性^⑥。

郑州牙璋会议上，除提供简要的会议资料外，还出版《东亚牙璋图展》一书^⑥，相同的内容亦于 2017 年春在香港中文大学“牙璋与最早中国图展”中展出。在此基础上，邓聪教授于 2018 年出版大型专刊《牙璋与国家起源》^⑥。

牙璋造型奇特，所以它的出现与变化颇受关注。从目前较可靠的年代数据可知，牙璋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 2400 年发展至公元前 900 年，长达一千五百年左右。最早约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罗圈峪遗址为代表^②。最晚约为金沙遗址的高峰期^③。

综览各种资料，笔者认为可以公元前 1520 年二

里头文化结束^④，作为时间节点，将一千五百年的牙璋历史分为前、后二期。各有近九百年与六百余年之久。前期从萌芽至发展高峰，以山东、陕北、河南、川西平原为主要发展的地区。本文第四节将讨论之。

可能属夏王朝晚期的二里头文化结束后，牙璋与多孔长刀基本退出中原，主因是商族发迹自华东，在华东崇尚动物精灵崇拜的传统里，雕琢动物形纹的玉器是主要的玉礼器^⑤。过去，因为二里头考古发掘开始得早，当 1986 年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发掘了二个大埋玉坑，出土 96 件牙璋和所谓“璋形器”时^⑥，学界多认为那是二里头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

笔者认为这种“想当然耳”的推论，是因为当时多数学者一直未能认识石峁文化牙璋的真面目，石峁文化牙璋具有极优质的质地，实用性强，制作量大，时代跨度约达七、八百年或更长，它可能是四川、河南这两区域牙璋的主要源头，不过河南地区牙璋可能同时受陕北和山东两个方向的影响（详后）。

如前所述，石峁牙璋的文化传统极可能顺着“边地半月形传播带”^⑦，经由甘肃、传播至川西平原，再传播至越南北部。前节已说明月亮湾文化牙璋和石峁文化牙璋在玉质与沁色的相似性（图八、图九），下一节笔者还会论证二文化牙璋在形制上的雷同。

月亮湾遗址与三星堆遗址虽仅一河之隔，但并非直接先后衔接的两个考古学文化。金沙遗址属十二桥文化，也邻近三星堆。金沙出土牙璋与“璋形器”共达 300 余件，金沙遗址第一阶段约中原的殷墟一、二期（约公元前 1320 至前 1200 年）^⑧，多使用石质牙璋，当时正是三星堆文化强盛时期。约商晚期后段至西周早期（约公元前 1200 至前 977 年）^⑨，三星堆遗址已经消亡或式微，金沙遗址先民才大量使用玉质牙璋。种种现象说明三星堆、金沙之间的权势兴衰更替与政权中心转移^⑩。

月亮湾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均在川西的成都平原，三者相距不远，关系密切。三星堆、金沙各出土 96 件与 300 余件牙璋（包括少量璋形器），可说是后期牙璋史（公元前 1520 至前 900 年）中最精彩的部分。而月亮湾文化的年代约与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相当，应属牙璋历史的前期晚段^⑩。

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冯原文化遗存也陆续发掘出牙璋。1994 年邓聪教授召开第一次牙璋会议时，何文璠教授公布当时出土了四件牙璋，也公布了冯原文化的碳十四数据，早中晚期约介于公元前 1800 至前 1050 年之间^⑩。2002 年以后邓聪教授与越南学者继续发掘，又出土三件牙璋^⑩。

越南考古研究院的 Trinh Hoang Hiep 参加 2016 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二次牙璋会议时，作了口头报告。

迄今越南共出土 8 件牙璋, 其中 7 件闪玉质, 1 件石质。出土牙璋的墓葬不但非典型冯原文化, 且多随葬其他贵重物品, 所以推测是与中国人交流时制作。他推测该批牙璋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2000 至前 1500 年间^④。

笔者未曾亲眼检视越南北部的牙璋, 但从已公布的图档看来, 其中有二件确实具有石峁文化晚期或月亮湾文化的牙璋风格^⑤, 邓聪教授于 2007 年论文中亦指明: “现今所知最具代表蜀地风格的因素, 在红河流域一带却未见明显的踪迹。”^⑥此处所指“蜀地风格”是指左右对称, 刃线作“V”字形三星堆文化牙璋。换言之, 越南北部出土牙璋中, 有二件不具典型三星堆风格, 反而出现更早的石峁文化晚期至月亮湾文化风格, 是否意味着它们可能由远程的移民直接携入, 再影响当地的仿制? 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多数学者认为在两湖、闽、粤、桂、香港出现的牙璋, 均来自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其年代多介于公元前 1500 至前 1000 年间^⑦, 但它们的质地少有真正闪玉, 石质为多, 甚至有骨质者, 不但数量少, 形制简化, 分散出现, 实际意义并不大。^⑧由于闽粤地区牙璋多出现于沿海地区, 是否沿着海岸线受到越北牙璋文化影响? 亦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四、探索牙璋的前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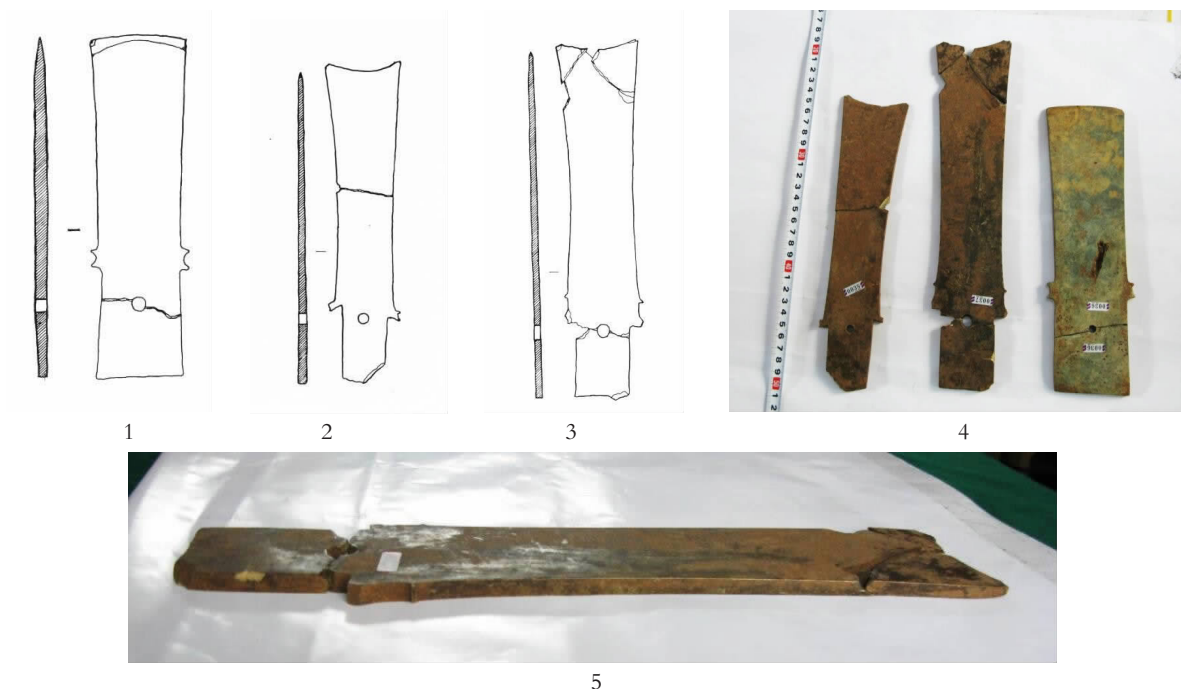
公元前 2400 年至前 1520 年为牙璋历史的前期, 此阶段约始自大汶口文化晚末期^⑨, 主要则在龙山时期至夏时期, 牙璋从萌芽发展到高峰。或因天候巨变等因素^⑩, 考古学资料显示此时发生较多的暴力侵略^⑪、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融合。锋利薄锐的牙璋, 尤其是含铁量高的墨玉牙璋, 很可能正是青铜兵器出现前最具杀伤力的兵器。

但考古学界相当忽略出土玉器质地的研究, 更常以为玉器的出土地点就是该玉器的制作地点, 导致一些错误说法长期存在。前文已分散地叙述五则有关牙璋的质地鉴定, 除第 1 则是检测考古出土器, 其余第 2 至第 5 共四则都是检测可靠的流散品:

1. 苏永江教授曾检测三星堆埋玉坑出土牙璋多为白色闪玉, 表面加涂由蓝、灰等多种颜料配成的一种黑里透红的颜色, 出土时器表已产生严重次生变化。

2. 陈光祖研究员检测台北故宫藏华西风格玉器, 确定是闪玉。此为笔者于 1990 年代初提出“华西系统玉器”观点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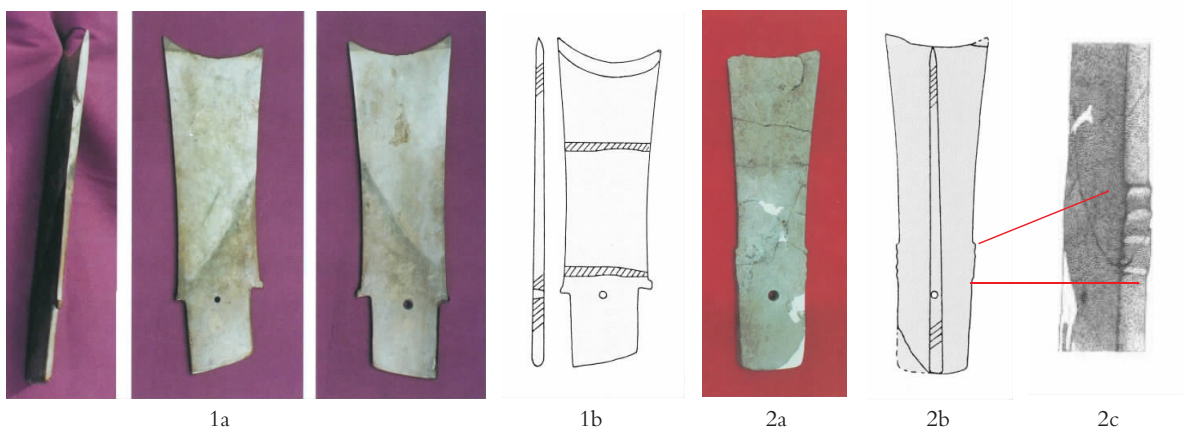
3. 闻广教授研究弗利尔博物馆藏多件石峁风格牙璋与长刀, 确知它们无论颜色从浅至深, 常保留变质前沉积岩文理, 是以极细小的“雏晶”构成, 也因此



图二三 大汶口晚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早期 牙璋(三件)

(沂南罗圈峪出土)

- 1, 罗圈峪 1 号牙璋(YL10), 长 24.8、宽 7、厚约 0.9-1 厘米 2, 罗圈峪 2 号牙璋(YL11), 长 25.8 厘米
3, 罗圈峪 3 号牙璋(YL12), 长 30.8 厘米 4, 笔者拍摄三件在未修补前彩图 5, 笔者拍摄 3 号平置桌面



图二四 山东龙山文化 牙璋(二件)

(临沂大范庄出土)

1, 大范庄1号牙璋 长32.8、厚0.6-1.1厘米 2, 大范庄2号牙璋 长27.5、厚0.6-1.0厘米

质地致密,可剖成长刀、牙璋之类大薄片的带刃器而不会崩破(图六、图七)。

4. 陈东和副研究员检测吉美博物馆藏石峁墨玉牙璋、长刀等,确知其中铁离子含量高达5wt%至12wt%左右,锰与镍的含量也较高(可参考图七、图一六、图一八、图二〇、图二一、图二二、图二九)。

5. 陈东和副研究员检测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藏月亮湾文化牙璋,确定其质为含铁量高达9.3 wt%的阳起石(Actinolite)。陈东和副研究员具丰富的检测石峁文化牙璋经验,他认为不排除月亮湾文化牙璋与石峁文化牙璋玉料相同,但需对考古出土(包括征集)器再做科学分析。

目前确知在公元前2400至前1520年期间,牙璋主要出现于四个地区:山东、陕北、成都平原、河南。山东境内出土五件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早中期的牙璋,其中只一件是闪玉质。在此区牙璋可能主要用作农具、工具。

陕北石峁附近应蕴藏含铁量高的墨玉矿(如图七),石峁先民也可获得其他地区蕴藏的灰青色系的闪玉料(如图六),所以用这两种闪玉制作大量牙璋、长刀,可能用作兵器。从造型推测,石峁牙璋的制作历史相当长,扉牙的造型从简到繁,器身长度也从20—30厘米的实用型,发展到高达53.5厘米的非实用巨大型。前文已说明,石峁牙璋传统可能传播至川西成都平原,发展出月亮湾文化牙璋。当然也可能是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牙璋文化的源头。中原地区的牙璋制作,受到山东、陕北两方面影响,但是中原地区无优质的闪玉矿,所以从新砦遗址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可能都非闪玉,且所用的石料亦非同属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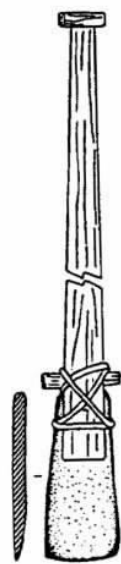
以上是以玉石质地为切入点,提要性勾勒四个地

区出土牙璋的特点。再分区详述于下。

(一) 山东地区牙璋

王强副教授用拉曼光谱仪及静水密度法检测山东境内牙璋。确定沂南罗圈峪三件牙璋均为蛇纹石(图二三)^⑤。临沂大范庄出土二件牙璋,检测了一件,确知为闪玉(图二四:1)^⑤。另一件未检测(图二四:2)。⑤笔者曾目验,后者是某种质地松而轻的矿物^⑤。这五件应是山东史前先民所制作。但基本上呈现二个阶段的造型。第一阶段二件,第二阶段三件。

由于与罗圈峪牙璋共出的其他玉石镯等呈现大汶口文化风格,栾丰实教授认为罗圈峪1号牙璋(图二三:1),可订为大汶口文化晚期^⑤。该器颇厚实,约0.9—1厘米,器身大致左右对称,扉牙作双并齿形,双面对磨中锋的刃线呈微凸弧形,有因使用而造成

图二五
石铲接柄示意图图二六
河姆渡文化 骨耜

的破碴。柄孔钻于柄部的中央偏高位置^⑧。

大范庄2号牙璋基本也属这类古拙风格(图二四:2),器身大致左右对称,双面对磨中锋的刃线呈微凹弧形,有使用造成的破碴。扉牙切割成约四分等分,夹出三条凹槽。邓聪教授认为,大范庄2号牙璋的扉牙造型,可能被河南境内新砦遗存先民所承袭^⑨。

罗圈峪1号、大范庄2号两件石质端刃器,都是器身厚实,本体与柄部约等宽,二者之间琢有可供绑缚绳索的简单扉牙,可供用作铲或耒耜(图二五、图二六)^⑩。属山东第一阶段牙璋。

罗圈峪2号、3号牙璋,与大范庄1号牙璋,基本造型相似。属山东第二阶段牙璋。它们有下列几个共通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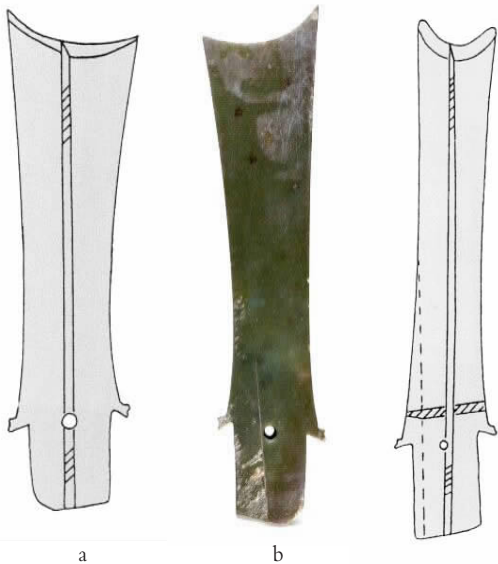
1. 都已发展出些许左右不对称的器身,左右二刃尖稍不等高,浅凹弧刃可为中锋、亦可为偏锋^⑪。刃部都有使用痕。

2. 本体与柄部之间的扉牙也不对称,上端刃尖高的一侧边,扉牙位置常比较低。

3. 扉牙之下的柄部宽度比本体的宽度窄,因此扉牙可简化成一个单牙,就足以牢固地绑稳木柄。这种单扉牙,流传至石峁文化时非常流行。林巴奈夫用日文字母称之为“ク”形,邓聪教授用英文字母称之为“D”形^⑫。

4. 若以直线连结左右扉牙,柄孔位于此一直线的正中央下方。

5. 本体器表出现浅浅的磨凹现象(图二三:5)。



图二七 石峁文化 牙璋
长 27.5、厚 0.4—0.5 厘米
(海阳司马台出土,同图一〇)

图二八
石峁文化 牙璋
长 33.5、厚 0.4—
0.6 厘米 (五莲上
万家沟出土)

此时,木柄是如图二五般与器身同向?还是如图一七般与器身呈近 90 度交角?还有待仔细观察刃部使用痕的方向,再做判断。

海阳司马台与五莲上万家沟的牙璋(图二七、图二八)^⑬,虽颇早出土且公诸于世,但过去多以为出土于山东就是山东史前玉器。这二件经检测确知均为闪玉质,图二七是几乎未受沁的墨玉,透光时呈现墨绿色,属典型石峁墨玉。图二八全器受沁颇深,偏棕褐色。检测者认为是所谓“甘肃料”^⑭。其实就是笔者所称的“华西玉料”(图六、图七)。

除了玉料特征外,这二件器身相当扁薄,厚度均约 0.5 厘米左右。器表均略呈微凹,刃部均磨成偏锋,本体左右轮廓线呈修长的凹弧,这些都是石峁牙璋的特点,读者可将之与图二九的 1—4 石峁牙璋对比观察^⑮。

(二) 陕北地区牙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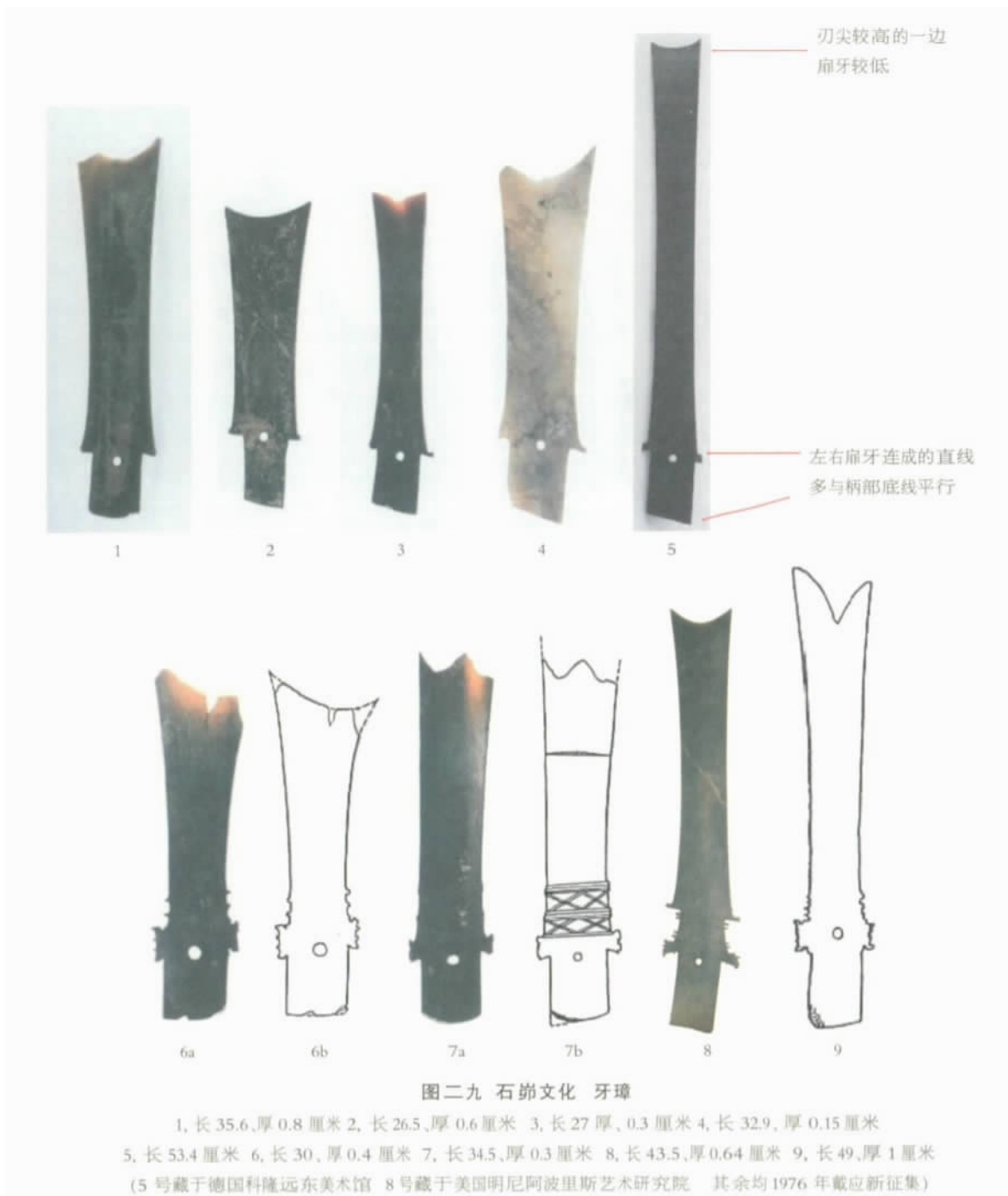
本文第二节已说明笔者于 2018 年论文推论:海岱地区牙璋与“华东式扉牙”向西传播,石峁先民用墨玉制作具杀伐力的薄锐型牙璋,用作兵器,有的装饰由“华东式扉牙”发展的“对称多尖式扉牙”,先民或认为这种扉牙具通神的神秘内涵。

事实上,除了墨玉外,石峁先民显然也可向西南方向的邻居获取如本文图六那种灰青色调的闪玉,所以石峁文化也有用灰青色闪玉制作牙璋,或类似的带刃器^⑯。图二九共有 9 件牙璋,图二九:4 即为灰青色闪玉,其余均为墨玉。

石峁牙璋不但存世者数量可观,且从造型可知,石峁式牙璋的制作至少延续近七百年,约公元前 2300 至前 1600 年,尚可能有一、二百年的末期发展至公元前 1500—1400 年。笔者根据牙璋对石峁文化所作的年代估算,与发掘者推测的年代下限不同^⑰,主要因为笔者除了出土器外,也关注可靠的早年流散品(详后)。当然希望日后的发掘与研究能够证实笔者的推测。

戴应新研究员在 1976 年征集的 28 件牙璋中,有 23 件是单扉牙牙璋^⑱。图二九:1 至图二九:4 这四件均属之。图二九:5 是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藏品。根据萨尔摩尼(A. Salmony)1931 年论文记录可知,它是 1929 年萨氏在北京附近从来自榆林府的农民手中购得,在科隆远东美术馆中编号为 H30.7,清楚记长达 53.4 厘米。^⑲这是目前查得石峁文化单扉牙牙璋资料中,尺寸最大的一件^⑳。

图二九:1 单扉牙有如斜坡,并未形成明显的突疙瘩,这种款式也确实存在。但从图二九:2 到图二九:5,都有清晰突起的单扉牙。典型石峁单扉牙牙璋的特点是:用墨玉或灰青玉制作,本体薄锐,器表多磨作浅微



凹(如图九左),具浅凹弧刃线,且多为偏锋^⑧,两个刃尖高低不一致。两个单扉牙也高低不一,但刃尖高的一侧,扉牙的位置常较低。连接二扉牙的直线常与柄部的底线平行。柄孔必钻于连接二扉牙直线的中央正下方。以便如图一七般绑缚木柄。因实际使用,故有的刃部残缺甚。但此时牙璋的柄部的宽度,不一定较本体的宽度窄。

虽然上述某些特点也隐然见于山东大范庄 1 号牙璋(图二四:1),该件质地亦是闪玉,但非石峁先民所用的墨玉或青灰闪玉。也可能山东先民主要用之为翻土农具,不追求薄锐锋利,所以它的厚度达

0.6—1.1 厘米。

图二九:6、7、9 三件也是 1976 年征集的。图二九:8 则是美国明尼阿波里斯艺术研究院藏品。前文第一节已说明,卢芹斋 1925 年书中已注记这类玉器多来自榆林府。卢芹斋 1950 年书中记录:吴大澂所藏大型黑色长片状器卖给美国的匹尔斯白瑞,而后者又捐赠给明尼阿波里斯艺术研究院。由此推测很可能图二九:8 即是吴大澂藏玉,被卢芹斋所卖出者。

从图二九:6、7 两件,以及前文图二〇可知,即或长度约 30 多厘米,本体薄锐可用以砍杀的牙璋,但扉牙也雕琢得颇繁复,甚至器表刻交叉网格线纹。图二

○及图二九:6 两件颇相似,多雕琢“对称多尖式扉牙”。这种扉牙造型,林已奈夫称之为“业字形侧饰”^⑧,邓聪教授曾仔细检视图二九:6、图二〇、图二九:9 三件实物^⑨,作了细致的记录,释其扉牙为“兽头与兽身组合成兽的整体,兽头分前后头。”邓聪教授认为采集自甘肃清水连珠村者,也是同类型扉牙^⑩。

图二九:8 这件在 20 世纪即流散至明尼阿波里斯艺术研究院的牙璋,已发表二次^⑪,但图片均不甚清晰。故此次专程向该艺术研究院柳扬主任提供较清晰的图档,特此申谢。图二九:8 这件的扉牙相当华丽,见表一之 1,器表刻画多条平行直线,最上方有“D”形单扉牙,中段二组“双并齿”,最下方琢出向左右斜下方伸出的“兽头”。结合月亮湾文化、二里头文化牙璋资料可知,这是公元前 1600 年前后流行的款式,笔者称之为“典型兽首式扉牙”。(详后)

图二九:6、7、8 以及图二〇,这四件扉牙雕琢华丽的石峁文化牙璋,柄部与本体的宽度相差不多,但均维持一个重要特征:柄孔的位置落在连接扉牙下缘直线的正中央下方,意味着它们可以如图一七般绑缚木柄,这四件中有三件的刃部都残断,也说明即或雕琢华丽的扉牙,依旧用来砍杀。是否在石峁文化中,单扉牙牙璋单纯用作兵器,只有雕琢复杂扉牙的牙璋,既可用作兵器,也可在祭典中用作敬神的礼器?有待继续探索。

图二九:9 这件牙璋就不一样了,它与前文第二节图一八是同一件,笔者已说明,若牙璋圆孔位于左右两侧宽扉牙所连成的宽横带上(可称为“宽扉牙区块”),那就无法绑缚木柄,而只能以刃端向上的方式用手捧执。这件牙璋除了此一特点相似于三星堆文

化牙璋外,刃线作“V”形,无使用痕,也是三星堆文化牙璋的主要特征。因此,笔者推测石峁文化一直延续至公元前 1500—1400 年左右。但晚期国势已弱,所以如图二九:9 的墨玉牙璋,存世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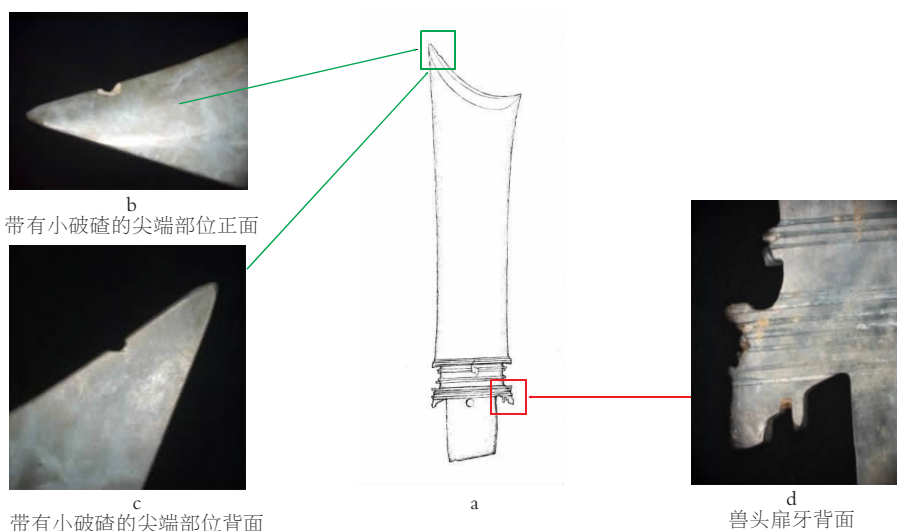
(三)广汉地区月亮湾文化牙璋

1927 年意外出土于四川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的玉器多已分散,目前留在四川的五件牙璋,典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三件^⑫,四川大学博物馆二件(图八)。这批早年从月亮湾出土玉器,迄今尚未检测质地。

台北故宫所藏月亮湾文化牙璋(图三〇),虽是上个世纪末购藏,但也经过多位重要专家的目验^⑬。近日常陈东和副研究员鉴定,质地是含铁量高达 9.3 wt% 的以阳起石为主的闪玉。这个数据相似于前述巴黎吉美博物馆藏石峁文化墨玉牙璋的数据,如前文图八、图九所述,月亮湾文化牙璋与石峁文化牙璋玉质的色泽特征甚相似,是否同一矿源?有待探索。

图三一为燕家院子出土牙璋(与前文图八左侧为同一件)。它与图三〇牙璋均为偏锋刃,从刃部、本体、扉牙到柄部,甚至沁色都很相似。扉牙下端向左右斜向伸出兽首,是典型“兽首式扉牙”。

图三二也是当年燕家院子出土牙璋,亦雕琢华丽的“兽首式扉牙”。全器长达 61 厘米,比例窄长,扉牙左右端高低差距大,导致器身具有较明显的弯度,此一特征相似于图二九-8,唯后者墨绿玉干爽少沁,属陕北风格,前文已说明,图二九-8 可能是早年经卢芹斋出售的吴大澂旧藏。所以图二九-8 与图三二的对比,也证实石峁文化与月亮湾文化间密切关系。笔者甚至怀疑,是否月亮湾文化牙璋直接来自石峁文化先民的馈赠^⑭?



图三〇 月亮湾文化 牙璋
长 36.7、宽 8、最厚 0.56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 线图 b-d 笔者所拍摄低倍显微照)



图三一 月亮湾文化 牙璋
长 36.7、宽 8、最厚 0.56 厘米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图三二牙璋的刃部已呈现从浅凹弧刃发展到“V”字形刃线的过渡中间型态,也暗示了月亮湾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⑩。

(四)河南地区牙璋

虽然玉质鉴定非常重要,但河南境内夏、商阶段遗址出土的多件牙璋,几乎都未经质地检测^⑪。从新砦期至所谓“商早期”遗址^⑫,共出土或征集八件完整牙璋与一件疑似牙璋扉牙部分的残块。

八件完整牙璋分别出自:新砦 1 件、偃师二里头 4 件、大路陈村 1 件、新郑望京楼 1 件、郑州杨庄 1 件^⑬。笔者均仔细观察过,可说它们在质地、造形、纹饰上,风格变化甚大。图三三是大致依照实物尺寸比例所排列^⑭。但因印刷关系,颜色不一定正确。

这八件牙璋都未检测质地,但笔者均仔细观察过实物。初步推测只有望京楼、杨庄二件的质地是闪玉,前者边缘有一截裂缝,后者基本没有断裂。其余六件质地可能均非闪玉。除了新砦牙璋器身厚实,似无伤断之外,其余五件均有严重断裂。

望京楼牙璋曾到台北的历史博物馆展出,其质地与本文图六相似,是带有不规则团块的浅灰青色闪玉,几乎未受沁,浅凹弧刃线上,使用痕不明显。图三三:7b 是此件局部特写,可清楚看到色泽文理,更可见扉牙至柄部的结构与图二九-8 石峁文化牙璋,以及图三〇、图三一、图三二共三件月亮湾文化牙璋相同,都是“典型兽首式扉牙”,从上到下有三单元:“D 形凸起”、“两组双并齿”、“向左右斜出的兽首”,器表刻著多条颇宽深的平行直线,直线的布局与左



图三二 月亮湾文化 牙璋
长 61、宽 8.1、最厚 0.6 厘米
(四川省博物馆藏)

右轮廓的凹凸切割相呼应,但直线不会刻到兽的口鼻部位^⑮。(请参考表一:2)

杨庄牙璋特别长大,展出于河南博物院,图三三:8b 是此件局部特写,可看出虽全沁为深浅交杂的棕褐色,仍隐然有沉积岩文理的不规则团块,散布细粒深灰色杂质。此件刃线已接近斜直线,使用痕相当明显。从局部特写可看出扉牙结构是将“典型兽首式扉牙”再复杂化,器表平行深刻直线更多,原本有定制的左右轮廓组合也变复杂了,“D 形凸起”变成“对称多尖式扉牙”,“两组双并齿”变成“四条平行宽带”,原本“向左右斜出的兽首”部分变得软棉,失去“兽首”该有的张口勇猛气势,横条平行线也布满至兽的口嘴部位。(参考表一:7)

望京楼、杨庄两件,从扉牙的结构解析,与图三三:3、图三三:5,分别出自二里头三期、四期的牙璋很相似。但望京楼、杨庄两件都是闪玉制作,两件的本体左右轮廓线均略带束腰般地优雅修长,还承袭石峁文化牙璋的帅气风格。它们应该不是二里头文化先民的作品。

图三三:1 至图三三:6 共六件非闪玉制品,可能是中原地区新砦至二里头文化先民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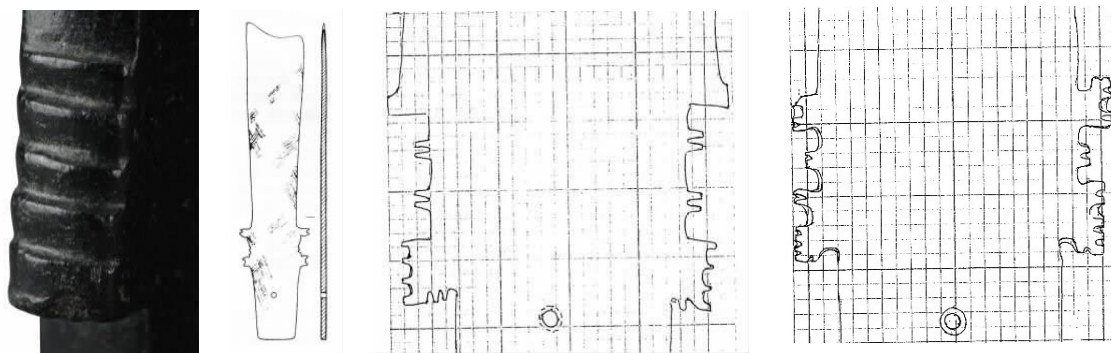
图三三:1 牙璋黑色石质,厚达 1.01 厘米,出自新砦遗址祭祀坑中^⑯。新砦遗址约公元前 1850 至前 1750 年。图三三:2 牙璋灰色石质有细微黑点,虽器身较长,厚度亦达 0.9 厘米。出自二里头三期墓葬,曾断为三截^⑰。二里头三期约公元前 1610 至前 1560 年^⑱。



图三三 河南境内出土与征集新砦期至二里头文化期八件牙璋

- | | |
|--|--|
| 三三:1 花地嘴:长 30、厚 1.01 厘米 | 三三:2 二里头 1 号(73YLIIIKM6:8):长 49.5、厚 0.9 厘米 |
| 三三:3 二里头 2 号(80YLV3:5):长 54、厚 0.55 厘米 | 三三:4 二里头 3 号(80YLV3:4):长 48.1、厚 0.8-1.1 厘米 |
| 三三:5 二里头 4 号(75YLVIHKM7:5):长 48、厚 0.4-0.5 厘米 | 三三:6 大路陈村:长 37.5、厚 0.45 厘米 |
| 三三:7 望京楼:长 39.2 厘米 | 三三:8 杨庄:长 66 厘米 |

别
具
只
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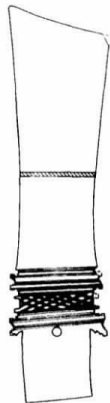
图三三:1b 新砦牙璋的扉牙部分
图三三:2b 二里头 1 号牙璋扉牙及柄孔
图三三:4b 二里头 3 号牙璋扉牙及柄孔
图三三:3b 二里头 2 号牙璋扉牙及柄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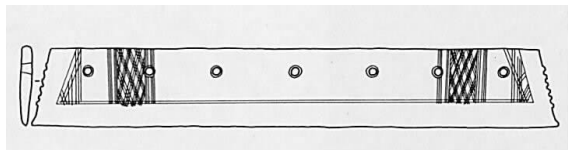
图三三:7b 望京楼牙璋扉牙及柄部(约二里头三期)
图三三:8b 杨庄牙璋扉牙及柄部(约二里头四期)
图三三:5b 二里头 4 号牙璋扉牙及柄部



图三三:5c 二里头4号牙璋刃端部分 (摄于洛阳博物馆陈列室)



图三三:6 大路陈村牙璋线图



图三四 二里头文化四期 七孔大玉刀

重的使用痕。本体的左右轮廓线比较平直,配合柄部底线平直,左右扉牙对称,致使整个器形也相当“端正直立”,缺乏石峁牙璋特有的帅气,后者是结合了本体的刀尖、扉牙、柄部底线,三者间适度的高低变化所营造的特殊风格。

大路陈村虽曾发掘到商代墓葬,但图三三:6这件牙璋是当地的采集品^⑧。笔者于2014年初冬检视了实物^⑨。它可能是蛇纹石质,深褐绿色夹杂很多黑点。刃部及本体下部均曾断裂,近乎平直的中锋刃线上布满使用痕。扉牙部分仍属“典型兽首式扉牙”的变体,左右下方的兽首已退化,右侧尚看出张口兽头,左侧已伤缺不全(表一:8)。扉牙区块的中段刻画交叉的格线,这种在整个装饰面积上不分区地满部格线纹的装饰手法,也见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玉刀上(图三四)。

笔者曾论证这样的格线纹或可能源自石峁文化^⑩,图二九:7石峁牙璋上也刻画格线纹,但那是将扉牙区块分为上下二份,每份上各刻画两个交叉。

所以图三三所排列的八件中,1号出于新砦遗址,2号出自二里头三期遗址,以上二件呈现较古拙风格。3—8号共六件基本都可算二里头三、四期(公元前1610至前1520年)^⑪。只是7号望京楼、8号杨庄很可能是石峁文化牙璋,因战争或其他因素传至中原,它们或是二里头先民仿制石质牙璋的母型。

五、小结

本文第二、三两节分别回顾笔者个人四十年研究牙璋的历程,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牙璋的活动。第四节则专注于公元前1520年之前牙璋的方方面面。综合质地与形制纹饰特征考量,提出几点研究心得:

(一) 玉石器研究当首重认识质地特点。没有丰富稳定的优质闪玉矿,就难以发展真正深厚的玉器文化。在史前至历史早期,闪玉是贵重稀有资源,易被交通近便的强势政权垄断,笔者观察与统计考古资料,肯定墨玉是石峁文化统治者垄断的资源,连其芳邻齐家文化先民都难以获得。玉器珍贵且体积小易携带,研究龙山时期的玉器,必须考虑玉质与风格特征,而非只以出土地为该玉器的制作地。至于近世在陕西、甘肃等地征集到石峁风格牙璋,多为石峁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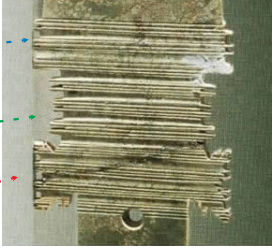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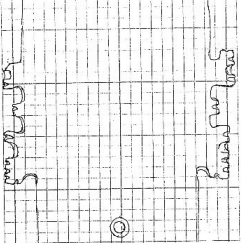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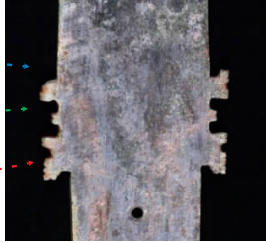
图三三:1、2二件器形特征甚为古拙。与罗圈峪1号石牙璋(图二三:1)、大范庄2号石牙璋(图二四:2)颇多相似处。新砦牙璋的扉牙切割成约五等分,夹出四条凹槽(图三三:1b)^⑫,相似于大范庄1号牙璋的扉牙(图二四:2c)。二里头1号牙璋的双并齿扉牙(图三三:2b)相似于罗圈峪1号牙璋(图二三:1)。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柄孔钻于整个柄部的中央,而不在左右扉牙连线的正中央下方。这种柄孔位置显示器物很可能像图二五般绑缚木柄,如铲子、耒耜般地操作。

事实上二里头3号牙璋的柄孔位置虽稍提高,也未贴近于扉牙底部连线,而这件的扉牙似乎是二里头先民尝试模仿石峁文化的“典型兽首式扉牙”的失败作品(图三三:4b、表一:9、10)。倒是二里头2号牙璋(图三三:3),这个高达54厘米的大个子,柄孔已上移到正确的位置——在左右扉牙连线的正中央下方(图三三:3b)^⑬。它的扉牙结构合乎“典型兽首式扉牙”,只是器表未刻出多条平行直线,兽首也不外侈,而朝向正下方(表一:5)。二里头2号、3号两件牙璋均各断为二截,它们的器表多沾满红色粉末,可能是硃砂之类的矿物。但2号牙璋还保持一面呈深灰色。

图三三:5是一件采集品,出自二里头四期的地层^⑭。它的光泽柔和,断成六、七截,推估质地甚软,笔者疑其为滑石、蛇纹石与绿泥石的共生矿?^⑮它与杨庄牙璋的相似之处为本体与柄部之间,雕琢了“复杂化兽首式扉牙”。但这件兽首僵化无气势,密密的直线刻到兽首的口鼻处。(图三三:5b、表一:6)^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扉牙制作得如此复杂费工,为何刃部却伤痕累累,显然时常用以砍凿(图三三:5c)^⑰。

图三三:2至图三三:5,是出土于二里头第三、第四期的四把牙璋,它们都是微凹弧、中锋刃,都有颇

表一 牙璋“兽首式扉牙”的演变

 <p>1.可能为石峁牙璋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院藏</p>	<p>上段“D”形单扉牙 中段二组“双并齿” 下段琢向左右斜出的“兽头”</p>	 <p>2.望京楼出土 “典型兽首式扉牙”</p>
 <p>3.月亮湾出土 “典型兽首式扉牙”</p>	<p>上段“D”形单扉牙 中段二组“双并齿” 下段琢向左右斜出的“兽头”</p>	 <p>4.月亮湾出土 “典型兽首式扉牙”</p>
 <p>5.二里头三期出土 “典型兽首式扉牙”</p>	<p>上段“D”形单扉牙 上段三组“双并齿” 中段二或三组“双并齿” 下段琢向下方的“兽头”</p>	 <p>6.二里头四期出土 “复杂化兽首式扉牙”</p>
 <p>7.杨庄出土 “变形化兽首式扉牙”</p>	<p>上段变形复杂扉牙 中段变形“双并齿” 下段琢向下方的“兽头”</p>	 <p>8.大路陈村出土 “变形化兽首式扉牙”</p>
 <p>9.二里头三期出土 “变形无兽首式扉牙”</p>	<p>上段变形复杂扉牙 中段变形“双并齿” 下方已无明显“兽头”</p>	 <p>10.二里头三期出土 “变形无兽首式扉牙”</p>

表二 四个地区牙璋流行时间段^④ (公元前 1520 年)

	2400	2300	2200	2100	2000	1900	1800	1700	1600	1500	1400
山东地区	←————→										
陕北地区			←————→								
川西盆地									←——→	←——→	
河南地区					←————→						

牙璋的流散品^⑤。

(二) 陕北、川西都因为蕴藏闪玉,所以可高度发展牙璋文化。山东与中原地区缺乏优质闪玉,前者制作少量农具、工具性质的厚实牙璋。后者在特殊时空条件下,用美石习做牙璋,却相当地“有形无神”。所以“牙璋源自中原”的说法必须放弃。

(三) 观察牙璋的穿孔部位及左右扉牙的高低落差,可推测它们绑缚绳索的方式,当圆孔钻凿于宽扉牙的区内,则只能用手捧执。这样的牙璋的刃部也多无使用痕,甚至呈“V”字形。

(四) 石峁牙璋薄锐、杀气重。当时尚无青铜兵器,但考古现象已确知当时杀戮之风已兴。石峁出土成坑女性头颅,如何杀殉?或可从研究牙璋弧刃砍凿痕迹入手。图二九:6、7 这样既雕琢华丽扉牙,又劈砍到刃部全毁的墨玉牙璋,或说明礼神时的礼器也是生活实用器。或许,杀戮就在祭典的祭坛上执行。

(五) 目前资料显示有的牙璋出于祭祀坑,有的出于墓葬。是否具不同意义?值得探索。

(六) 牙璋的古代器名究竟为何?闻广和孙庆伟两位教授都认为很可能即是古文献中的“玄圭”。闻教授手写资料经笔者转述发表^⑥。孙教授则撰文详论之^⑦。

特以表一陈述石峁、月亮湾、二里头三个文化中,牙璋的“典型兽首式扉牙”,经过“复杂化兽首式扉牙”,发展出“变形化兽首式扉牙”及“变形无兽首式扉牙”的历程。又在表二中,以色带标示四个地区牙璋流行的时间段。

注释:

①《诗经·大雅·棫朴》:“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赞美君王仪态端庄的诗歌。《大雅》共 31 篇,被认为是西周早期贵族作品,多歌颂王室祖先。

②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梁带村芮国墓地:二〇〇七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图一出自此报告。

④《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⑤联志村资料较早出版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文物精华·玉器》,世界图书出版,2004 年。当时被断代为秦代。也曾断代为战国时的秦国,但梁云考证认为是西汉。见:梁云:《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5 期。图二引自:刘云辉编著:《陕西出土东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⑥《周礼·春官·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⑦吴大澂:《古玉图考》,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清)光绪 15 年(1889 年)。

⑧图四引自:沈辰:《故人似玉由重来——吴大澂旧藏玉璧流传轶事》,《美成在久》2015 年第 9 期。图四与图三比例与细部稍有异,但可能是同一件。苏州博物馆于 2017 年举办吴大澂及其孙吴湖凡藏品展并出版图录:《梅景传家——清代苏州吴氏的收藏》,译林出版社。书中公布多件吴大澂藏玉,以图四这件最相似于图三。

⑨Loehr, Max, (罗越)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Grenville L. Winthrop collection in the Fogg Art Museum*, Cambridge, Mass.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Pl.220. 1985 年哈佛大学萨克勒博物馆 (the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落成后,福格博物馆 (Fogg Art Museum) 所藏亚洲文物拨交给萨克勒博物馆典藏。

⑩Pelliot, Paul, (伯希和), *Jades archaïques de Chine appartenant à M. C. T. Loo*, Paris: Librairie Nationale d'Art et d'Histoire, 1925.

⑪张长寿:《论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第 59 页,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年。榆林府在陕北,即今日榆林市,辖内神木市石峁遗址是龙山时期石峁文化主要所在地。

⑫C. T. Loo,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chaic jades, arranged for Norton Gallery of Art*, West Palm Beach, Flori-

da, January 20 to March 1, 1950.

⑬吉美博物馆藏中国玉器,仅部份发表于: Sao, Huei-chung (曹慧中) directed, *Jade, from Emperors to Art Deco*, Co edition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Paris, Somogy Art Publishers, 2016. 明尼阿波里斯艺术研究院在1977出版图录: Na Chia-liang and Peterson, Harold, *Chinese Jades, Archaic and Modern, from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1977. 近年多件又发表于: 江伊莉、古方:《美国博物馆馆藏中国早期玉器》, 科学出版社, 2009年。

⑭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⑮如本文引述的张长寿、王永波等学者论文,都依循夏鼐命名。

⑯林巳奈夫是较早研究牙璋的学者,他称之为“骨铲形玉器”,称三个部位为:“本体”“侧饰”“基部”。[日]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石庖丁形玉器と骨铲形玉器》,原发表于1982年《东方学报》第五十四期,修改后刊于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1年。但邓聪在其2014年论文中,称这三个部位为:“本体”“扉牙”“柄部”,见邓聪、栾丰实、王强合著:《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山东省博物馆等:《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笔者认为后者较合乎中文称法,故采用之。

⑰在欧美博物馆多展出它们熟悉的古文明,如埃及、希腊、罗马等文化遗物。中国古物中以书画、佛像、铜器、瓷器较有机会展出。大部分的中国古玉是被冷藏于库。

⑱2012年以来,由于陕北石峁的考古受到重视,大陆媒体开始谣传海外流散(主要指20世纪流散至欧美)“四千件石峁玉器”,甚至有文化官员身份的人也跟着传播此一无中生有的谣言。事实上,欧美各博物馆所藏中国黄河上中游的史前至龙山晚期玉器(包括仰韶文化至齐家文化、石峁文化等)可能都达不到四千件,更何况“石峁玉器”定义尚未厘清,真正无疑义的“石峁玉器”应只是墨玉制作的牙璋、多孔长刀、戈等。因为石峁文化时,陕北已是齐家文化传播的外缘地区,齐家风格玉器广布于黄河上中游的史前至龙山晚期遗存中。

⑲图六、七引自:江伊莉等:《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第182,261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⑳a 戴应新:《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b 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㉑nephrite的中文译名甚多,“闪玉”之外或可称为“透闪石软玉”“软玉”“透闪石玉”“和阗玉”等。闪玉是钙和镁的硅酸盐矿物,主要是透闪石(tremolite)和阳起石(actinolite)的固态溶体。

㉒邓淑苹:《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及相关的礼器》,(台北)《故宫学术季刊》八卷一期。1990年;邓淑苹:《“华西系统玉器”观点形成与

研究展望》,(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5卷2期,第1~54页,2007年。亦出版于《玉魄国魂(三)——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燕山出版社,2008年。(收入《名家论玉(二)》2009年)

㉓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许宏主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在该书彩版中刊出四种典型华西闪玉的彩图。但笔者2019年出版的《故宫玉器精选全集·I·玉之灵(上)》中,增加一种不透明牙黄色闪玉,墨玉改为第五种华西闪玉。

㉔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六)》,(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总号125~130,1993年8月至1994年1月。原本记录是127件,其中一件出自贺家川,故予以剔除。在台公布的资料中,有3件是半坡博物馆在石峁征集,有2件玉环是戴应新在石峁附近新华遗址征集的,连同数件未发表的残件,一共126件。

㉕当时(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的编辑小组向笔者反映,因戴应新研究员的报导主要为器物尺寸与保存情况,器物形制多相似,既无纹饰,色泽又不美,打算不予刊登。笔者为了将这批重要玉器以彩图公诸于世,就答应配合戴文内容撰写六篇,好令戴文得以近乎全彩发表。

㉖此是戴应新先生亲自告诉笔者的史实。

㉗邓淑苹:《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二)——牙璋》,(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1卷6期,总号126,1993年9月。

㉘月亮湾与三星堆以马牧河相隔,本非同一地点,但都属于广汉市。约1927年(或说1929年,1931年)月亮湾北端燕道诚家院子出土大坑玉石器,多以流散,目前在四川省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保留一些。该批年代应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相当。1927年的说法依据: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至于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到二个大理玉坑,年代约在商代中晚期,可能跨至西周早期。

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㉚[日]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石庖丁形玉器と骨铲形玉器》,《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1年。

㉛此二位古董商各有两本重要出版品。卢芹斋(C.T. Loo)于1925年与伯希和(Paul Pelliot)联合出版法文大书: Pelliot, Paul, *Jades archaïques de Chine appartenant à M. C. T. Loo*, Paris: Librairie Nationale d'Art et d'Histoire, 1925. 1950年又于美国出版展览图录: C.T. Loo,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chaic jades, arranged for Norton Gallery of Art*,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January 20 to March 1, 1950. 黄浚分别在1935年、1939年出版《衡斋藏见古玉图》、《古玉图录初集》,北平尊古斋印制。

㉜1994年拙文中统计,流散海外54件牙璋中,约40件是典型石峁文化风格。1925年海外牙璋资料见上注伯希和的法文大书。

㉝邓淑苹:《扑朔迷离话牙璋》,(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2卷3期,总号135,1994年6月。

⑭大范庄、司马台的考古报告为:a 冯沂:《山东临沂市大范庄调查》,《华夏考古》2004年第1期;b 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大范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1期;c 烟台市文管会等:《山东海阳司马台遗址清理简报》,《海岱考古》(第1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⑮近年出版品多改称海阳司马台遗址为“海阳市行村镇杜格庄村”。本文依旧沿用最初报导时的地名“司马台”。

⑯于秋伟:《山东沂南新发现的牙璋和玉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5卷11期,总号179,1998年2月。

⑰这份资料在大陆也简要发表。于秋伟:《山东沂南县发现一组玉、石器》,《考古》1998年第3期。

⑱沂南罗圈峪出土品中还有一个残块,被部分学者释为牙璋的局部,而认为罗圈峪出4件牙璋。

⑲“月亮湾文化”是笔者所创的名词。主要指1927年(或说1929年或1931年)在马牧河之北的月亮湾出土约属夏时期晚段的玉器。它们与1986年在马牧河以南三星堆出土两坑商代中晚期玉器,可能并非属于先后承袭连续的文化产物,至少目前存在明显的“缺环”。四川考古单位将全都编成“三星堆文化”,有待商榷。

⑳邓淑苹:《由院藏三星堆文化牙璋谈起》,(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7卷2期,总号194,1999年5月。本文第四节图三〇发表此件线图与低倍显微照。

㉑燕家院子发现成坑玉石器的年份,有多家说法。许杰的考证是1927年。见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㉒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许宏主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此文最前面部分,另发表为:邓淑苹:《龙山时期四类玉礼器的检视与省思》,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㉓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9年。

㉔a.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b.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玉大系》,2011年;c.张尉:《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d.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藏品选》,文物出版社,1999年;e.孙传波:《旅顺博物馆藏刀形端刃器及分期研究》,《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此外,北京故宫、南阳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金沙博物馆还藏有属于月亮湾风格的牙璋。

㉕台北故宫藏二件,尚未发表。震旦博物馆藏二件(其中一件造型特殊)。邓淑苹:《群玉别藏续集》,1999年。

㉖笔者接受以二里头文化为夏代晚期的论点。以公元前1520年作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结束年份,系根据:仇士华:《碳十四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㉗“万国玉帛”典出:《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少数版本作“执玉帛者万邦”。

㉘闻广先生多次口头告知笔者他的研究心得,“疙疙瘩瘩”是闻先生对典型华西玉料最常用的形容词,即是如图六玉刀那样,有时闻先生会用“布丁石结构”描述。他交给弗利尔博物馆的报告迄今尚未出版,部分成果发表于闻广:《中国大陆史前古玉若干特征》,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

㉙陈东和研究成果发表于其法国凡尔赛大学博士论文中,CHEN, Tung-Ho, *Etudes physico-chimiques des jades chinois,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Restauration des Musées de France*, 2005。本文图七就是这种玉料。

㉚笔者于2006年向陕西历史博物馆申请检视戴应新征集牙璋,并蒙准发表所拍摄图片(本文图九、图一六、图二〇),特此申谢。

㉛留在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的月亮湾文化牙璋并未被检测质地。但是台北故宫藏一件月亮湾文化牙璋,经陈东和检测,确知属阳起石为主的闪玉,含铁量高达9.3wt%。与石崩墨玉相似。本文第四节会再论及。

㉜a 苏永江:《广汉三星堆出土玉器考古地质学研究》,《四川考古论文集》,第85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b 苏永江:《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玉器残片鉴定报告》,《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㉝图一〇引自:林仙庭主编、烟台市博物馆编:《考古烟台》,齐鲁书社,2006年。图一一为笔者2008年摄于海阳博物馆陈列室。图一二引自:王永波:《关于刀形端刃器的几个问题》,(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6月,总135。

㉞图一三引自:孙周勇、邵晶:《石崩遗址的考古发现及有关石崩玉器的几个问题》,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图一四引自: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㉟梁星彭、严志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200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图引自中华玉文化中心等:《玉魄国魂——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㊱陶寺文化发掘者何努研究员曾口头表示确有这种可能,尚待发掘来证实。

㊲黄翠梅:《殷墟出土的有领玉环及其相关问题》,《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㊳童恩正于1986年发表《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考古论集》,1986年);认为在这个半月形地带,地貌、降雨量、日照等因素的相似,导致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处。

㊴吉开将人:《论“T字玉环”》,邓聪主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马来半岛 Gua Cha 出土二件有领璧藏于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笔者1980年、2012年两度检视,资料发表于拙著,《璧与有领璧——乾隆皇帝的笃信与困惑》,(台北)《故宫文物

月刊》2015年3月号,总号384。

⑩所谓“左右两扉牙所连成直线”是观者目睹实物时想像的“直线”。器表并未刻画这条线。所谓“下方”,是指向着器柄底端的方向。

⑪从海外流散可靠的资料可知,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还藏有长达53.3厘米石峂牙璋。将讨论于本文第四节。

⑫图一八引自:戴应新:《神木石峂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二)》,(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9月,总号126。图一九引自: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纪录——青铜器》,天地出版社,2009年。

⑬邓淑苹:《交融与创新——夏时期晋陕高原玉器文化的特殊性》,《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⑭图二〇引自:中华玉文化中心等:《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⑮图二一引自: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⑯许国栋:《“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四届年会纪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玉器考古通讯(二)》,2013年。

⑰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⑱曹芳芳:《“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玉器考古通讯(八)》,2016年。

⑲李伯谦:《再识牙璋》,《华夏文明》2017年第2期。

⑳邓聪、顾万发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合办,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东亚牙璋图展2016—2017》,香港中文大学,2016年。

㉑邓聪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编:《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㉒栾丰实:《大汶口和良渚》,山东博物馆等:《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

㉓王方:《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综述》:“从目前玉器的出土情况看,其埋藏年代集中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少量玉器埋藏的下限约当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张擎:《金沙遗址出土牙璋的初步研究》“大形牙璋……的时代大体在殷墟二、三期之际至西周早期之时。……小型玉璋……埋藏时代大体在殷墟二期至西周初期。”以上二文原发表于2004,2006后局部修改收入:王毅、邓聪主编,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金沙玉工(1)》,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㉔仇士华:《碳十四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㉕邓淑苹:《玉礼器与玉礼制》,《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㉖96件数据引自张擎:《金沙遗址出土牙璋的初步研究》同注72。所谓“璋形器”多指平行四边形器、直角梯形器等。

㉗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考古论集》,1986年。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认为在此半月形地带,地貌、降雨量、日照等因素的相似,导致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处。

㉘殷墟一期属商中期的最后阶段,殷墟二期属商晚期的第一阶段。此处年代数据依据:仇士华:《碳十四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㉙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元前977年约是西周昭王、穆王之交。

㉚王方:《金沙遗址出土石璋及初步认识》,曹芳芳:《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玉器考古通讯》第八期,2016年。

㉛林巴奈夫称月亮湾出土牙璋为:“二里头并行期”,[日]林巴奈夫:《中国古代の石庖丁形玉器と骨铲形玉器》,《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1年。

㉜Ha Van Tan, Yazhang in Viet Nam, (何文璠:《越南出土牙璋》)。邓聪:《越南冯原遗址与香港大湾遗址玉器对比是释》,二文均发表于:邓聪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㉝邓聪:《中越牙璋竖向刻纹辨识》,《三星闪烁·金沙流采——神秘的古蜀文明》,香港文化博物馆,2007年。

㉞此位越南学者的报告未刊于会议所发的资料,但记录于:曹芳芳:《“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玉器考古通讯(八)》,2016年。

㉟1994年牙璋会议出版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彩版5公布4件中,最右和最左各一件。

㊱邓聪:《中越牙璋竖向刻纹辨识》,《三星闪烁·金沙流采——神秘的古蜀文明》,香港文化博物馆,2007年。

㊲邓聪:《牙璋与初期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盱古衡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17年。早年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出土的牙璋,曾被断代于战国至西汉,邓聪先生告知,近年已按照陶器编年改定商早期偏晚。

㊳王亮等:《关于岭南所件牙璋的分布及相关认识——从东莞村头谈起》,2016年第二次牙璋会议所发资料中有简单提要,曹芳芳的会议纪要亦有登录。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玉器考古通讯》第八期,2016年。骨质牙璋出于村头遗址。

㊴按照文明探源工程结案后发表的年表,龙山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该表发表于:常怀颖:《早期中国视野中的夏王朝》,《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2018年6月11日。因为罗圈峪遗址中出现大汶口文化晚期遗物,故笔者将牙璋历史提早至公元前2400年。

㊵a.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b.吴文祥、刘东生:

《4000BP 前后东亚季风变迁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衰落》，《第四纪研究》第 24 卷第 3 期，2004 年第 5 期。

⑨如陶寺文化中、晚期之交，清凉寺墓地第二、三期之交，都在遗存中出现残酷的凶杀凌虐现象。

⑩2008 年夏，承蒙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协助，及沂南文管所高本同所长与临沂博物馆王宝安馆长的同意，得以检视实物，特此申谢。又承蒙沂南文管所准予发表图片，特此申谢。线图引自：于秋伟：《山东沂南县发现一组玉石器》，《考古》1998 年第 3 期。

⑪王强等：《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牙璋的材质和制作工艺初探》，宣读于 2016 年郑州的牙璋会议。重点发表于曹芳芳：《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玉器考古通讯》第八期，2016 年 12 月。

⑫王强先生告知笔者。特此申谢。

⑬图二四：1 及图二四：2a,2b 引自：王永波：《关于刀形端刃器的几个问题》，（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2 卷 3 期，总号 135，1994 年 6 月。图二四：2c 为笔者助理根据所拍图档绘制。

⑭栾丰实：《大汶口与良渚》，山东博物馆等：《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⑮笔者仔细观察过实物，故描述属实。

⑯邓聪等：《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山东省博物馆等：《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⑰图二五引自：李仰松：《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工具试探》，《考古》1980 年第 6 期。图二六引自：[日]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祭玉、瑞玉》，《东方学报》京都第 40 册，1969 年，收入《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1 年。图为江村治树拍摄。

⑱所谓“中锋刃”，就是由正反两面对磨出尖锐的刃部。所谓“偏锋刃”，就是由一面磨出尖锐刃部，另一面保持平直光素器表。

⑲a.[日]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石庖丁形玉器と骨铲形玉器》，《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1 年；b.邓聪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 年。

⑳图二七 a、图二八，引自：王永波：《关于刀形端刃器的几个问题》，（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2 卷 3 期，总号 135，1994 年 6 月；图二七 b 引自：山东省博物馆等：《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 年。

㉑王强等：《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牙璋的材质和制作工艺初探》，宣读于 2016 年郑州牙璋会议。曹芳芳所作会议纪要要有纲要性记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玉器考古通讯》（八）2016 年。

㉒图二七的单牙是标准的所谓“ク”形或“D”形扉

牙。有学者因图二七的单牙上有一伤凹，另称之为“马鞍”形扉牙。实属多余。

㉓目前用带沉积岩纹理灰青闪玉制作的有刃器，最大的一件出自陕西陇县王马嘴，长 77.2、宽 32.5 最厚 1 厘米。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线图发表于：肖琦：《陇县博物馆收藏的玉璋》，《文博》1993 年增刊第二号，彩图发表于：王长启主编：《中华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玉器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据笔者探访玉器资料的经验，陇山周围城市：陇县、静宁、会宁、固原、隆德等地，多出体积大的齐家系璧、琮、带刃器等。显示这种灰青色闪玉可能蕴藏于陇山地区。近年石峁遗址也发掘出用这种浅青灰色闪玉料，制作长达五十多厘米的端刃器；也出土这种玉料制作的牙璋的扉牙部位残片。

㉔孙周勇：《公元前第三千纪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考察——以榆林地区考古资料为中心》，《考古与文物》2016 年第 4 期。文中认为年代下限为公元前 1800 年。晚近资料显示：“石峁文化结束即石峁城址废弃之后，皇城台等地点还零星分布着一类以蛇纹鬲为典型陶器的遗存，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 1700 年至前 1600 年左右。”见：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 年第 1 期。

㉕完整发表于：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二）》，（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93 年 9 月，总号 126。

㉖张长寿：《论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年。文中记载非常重要：“萨氏于 1929 年深秋作为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的代表到达北京，年底，一位中国古董商人建议他租一辆汽车到一个几小时路程远的农村，去会见正在来北京途中的几个榆林府的农民。它们在自己的田地里发现了玉器。萨氏听从了并会见了这些农民。它们出示 36 件黑玉和 6 件绿玉，都是刀形端刃器和刀形器，大小不等，完好的程度也各异。结果他选购了一件最大的黑玉端刃器（Inv. No. H30.7，长 53.4 厘米），一件最大的绿玉刀形器（Inv. No. H30.1，长 34.5 厘米），和另外两件较小的标本，由科隆远东美术馆收藏。……至于其他的 38 件玉器就在古董商人的手中转来转去，最后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欧洲和美国。”根据张文附注可知，是魏沙彬（Sabine Werner）教授提供萨氏 1931 年论文，并查阅科隆远东艺术馆对四件石峁玉器的人藏底册。

㉗图二九-5 引自：[日]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石庖丁形玉器と骨铲形玉器》，《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1 年。

㉘据笔者初步统计，单扉牙牙璋偏锋刃的磨法多为：将刃尖放成“左高右低”时为正面，再从正面向下磨薄，背面不磨而保持平直器表。所以图二九-

1,2,3,4,5 五个图,都显示牙璋的背面。

⑩[日]林巳奈夫:《中国古玉の鉏牙》,《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1年。

⑪戴应新征集这批玉器均典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三件的典藏号为:SSY18、SSY15、SSY17。

⑫邓聪:《牙璋在西北的扩散——甘肃牙璋》,《华夏文明》2017年第12期。收入邓聪主编:《牙璋与国家起源》,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⑬a.[日]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石庖丁形玉器と骨铲形玉器》,《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1年;b.江伊莉等:《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9年。本文图引自后者。

⑭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

⑮图三〇牙璋是1994年购藏,1995年四川大学林向教授曾目验鉴定,1999年三星堆出土文物赴台展出时,随展人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研究员等人,亦曾目验肯定之。

⑯燕家院子资料四散,很难具体研究。但确知出土时有从大到小堆叠的很多石璧,也见零散存在玉琮。石砮文化基本不见璧与琮,但有与铜箍组合当作腕饰的大孔璧。

⑰图三一、三二均引自: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

⑱笔者查得关于河南出土早期玉器质地检测数据为:董俊卿、干福熹等:《河南境内出土早期玉器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1年第3期。其中无牙璋。

⑲大路陈村牙璋、杨庄牙璋的考古报告中都说明是采集品。见: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许昌县大路陈村发现商代墓》,《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b.赵新来:《郑州二里岗新发现的商代玉璋》,《文物》1966年第1期。望京楼牙璋也是征集品。直到2005年《中国出土玉器全集》里还订望京楼、杨庄牙璋为商代。但从形制纹饰可确知应属夏时期玉器。至于河南桐柏县月河镇春秋时期遗址出土牙璋,虽也是早期遗物,但本文不收入讨论。

⑳王永波认为浙川下王岗出土一个只剩简单的扉牙与柄部部分的残件亦是牙璋,笔者认为该件本体部分所余甚短,不排除是本体短,且上端平刃的工具。不宜列为牙璋。

㉑图引自:邓聪、顾万发:《东亚牙璋图展》,香港中文大学,2016年。

㉒图三三:7b、图三三:8b均为黄翠梅拍摄。

㉓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

㉔二里头1号牙璋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8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5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㉕新砦遗址及二里头三期年代依据:仇士华:《碳十四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㉖引自:中国玉文化中心:《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第10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㉗图三三-4b、图三三-3b均引自:[日]林巳奈夫:《中国古玉器总说》,第283页,及川弘文馆,1999年。

㉘二里头2号、3号牙璋初自同一座墓葬,报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㉙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

㉚台北故宫有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末期龙山文化风格玉石钺,色泽质感与二里头4号牙璋相似。笔者测其比重硬度,日本地质学家茅原一也教授曾目验推测为:滑石、蛇纹石、绿泥石共生矿。邓淑苹:《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及相关的礼器》,(台北)《故宫学术季刊》8卷1期,图九三,1990年。

㉛图引自:周剑曙等:《偃师文物精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㉜江美英摄于洛阳博物馆展场。

㉝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许昌县大路陈村发现商代墓》,《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㉞承蒙许昌博物馆张松莉馆长许可,检视该馆库藏大路陈村出土玉器,特此申谢。

㉟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许宏主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㊱仇士华:《碳十四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㊲近年台北故宫蒙民间人士捐赠二件墨玉石砮风格牙璋,就是得自甘肃。

㊳地质学家闻广教授前往美国研究流散石砮玉器,再赴甘肃临洮考察玉矿,更搜罗《尚书·禹贡》《史记·秦本纪》《礼记·檀弓上》《水经注·洮水》《博物要览》《北堂书钞》等资料,考证文献中的“玄圭”可能即是“墨玉牙璋”。约2010年,他手写其观点交付笔者。笔者于2014年论文《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第245页中详载之。

㊴a.孙庆伟:《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的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b.孙庆伟:《再论“牙璋”为夏代的“玄圭”》,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论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㊵川西地区以两个分离绿色段,显示同一地区月亮湾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并非先后密切衔接的两个文化。

(责任编辑:周广明)